

殖民统治与族群的形成^{*}

——二战以来西方学界的非洲族群研究评述

李鹏涛 车能

【内容提要】二战以来，围绕着殖民统治与族群形成之间关系这一主题，西方的非洲学界进行了大量的深入研究，相继出现了部族与城镇化、族群与非洲国家建构、建构主义理论、建构主义反思等研究流派。相关研究表明，前殖民时代的非洲并不是由界限鲜明的部落所组成的僵化停滞的社会。“部落”或“族群”是在殖民统治时期形成的，不过它们并非殖民者的创造物，而是非洲社会建构过程的产物。殖民统治急遽改变了非洲的社会结构和空间组织，成为塑造族群认同的主要结构因素。“族群”的形成建立在非洲社会结构演变的基础之上，是非洲现代化经历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非洲；族群；部族；殖民统治；现代化

【作者简介】李鹏涛，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副研究员（金华，321004）；车能，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硕士研究生（金华，321004）。

“族群”或“部族”是非洲研究中的一个基本概念，对它的理解关系到对于殖民历史以及后殖民时代非洲国家发展的理解，因而它一直是西方

* 本文系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2016年赴非调研课题《英属东非殖民地的城镇化进程研究》(项目编号: FF201601)的阶段性成果。

的非洲族群研究所关注的焦点。自二战以来，西方的非洲族群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重要的学术观点不断涌现，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建构主义理论的兴起及其所受到的批判，极大地丰富了非洲族群研究的理论视野。就笔者所知，目前国内学界已经深入探讨了非洲“部族”“部落”和“族群”等概念的内涵，但未曾对西方的非洲族群研究演进脉络进行过系统梳理。本文拟从历史背景、主要流派及代表观点、阶段特点等方面简要分析西方的非洲族群研究的历史演进，以期深化我们对于非洲族群以及族群理论的认识。^①

— “城镇中的部族主义”：中非地区的部族与城镇化研究 (20世纪50—60年代)

二战后，随着非洲殖民地的经济发展和城镇化发展，非洲殖民地的社会变迁尤其是移民劳动力和城镇化进程，成为英国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北罗德西亚（今赞比亚）的铜矿带（Copperbelt）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大规模开发，此后该地区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当时被视作“非洲崛起”的象征，这里也成为英国人类学较早思考非洲社会变迁的关注点。1938年，罗德斯—利文斯顿研究所（Rhodes-Livingstone Institute）在北罗德西亚的利文斯顿成立，马克斯·格卢克曼（Max Gluckman）、克莱德·米歇尔（J. Clyde Mitchell）和阿诺德·爱泼斯坦（Arnold Leonard Epstein）等人类学家进行了大量深入的调查研究，他们主要关注劳动力流动、婚姻模式变迁、部族主义、工会组织和法律变迁等议题，对非洲族群和人类学研究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罗德斯—利文斯顿研究所与当时英国人类学研究重镇曼彻斯特大学人类学系通力合作，共同开创了一个重要的人类学流派——“曼彻斯特学派”。

当时的殖民统治者声称，铜带城镇中的非洲人基本上是“部落民”，并不属于城镇，他们只不过暂时在“白人城镇”中逗留。这反映了白人殖民者对于占人口多数的非洲人定居于城镇所带来的潜在危险的担忧，同

^① 关于“部族”、“部落”和“族群”等概念的辨析，参见李安山《非洲民族主义研究》，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4年版，第195—219页。

时也是为殖民政府在城镇公共设施建设投入匮乏而辩护。殖民者认为，移民劳工对于城市环境的适应基本上是“去部族化”(detribalization)的过程，按照这一逻辑，非洲人并不属于城镇，因为来自农村的非洲人无法适应现代城镇生活。^①

对于殖民者的这一谬论，罗德斯—利文斯顿研究所的人类学家们予以严厉批驳。格卢克曼等人强调，城镇和农村部落家庭代表着不同的社会环境，移民们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行为方式与组织形态，“当一个非洲人跨出自己的部落领地时，我们可以说他在部落之外，是‘去部落化’的，虽然部落的影响仍然还在。相应地，当一个人从城镇回到自己所属部落时，他是部落化的，或者说是去城镇化的，尽管城镇影响仍在”^②。格卢克曼由此提出了“城镇中的部族主义”(tribalism in town)的概念，强调移民劳动力的行为方式和组织形态并非农村制度和行为方式在城镇生活中的自然延伸，而是一种独特的城镇现象，它首先是“将共同居住在城镇中、来自不同农村地区的非洲人加以区别分类的方法”^③。格卢克曼等人通过严谨的学术研究，刻画出了城镇非洲人的形象，并且指出这些城镇化非洲人的出现以及移民劳动力体系的消亡，标志着非洲人完全可以融入现代社会。

而米歇尔则通过分析当时在铜带省流行的“卡列拉舞”(Kalela Dance)揭示出“部落”之间不仅存在着竞争和类型化(stereotyping)的复杂关系，而且它们之间还相互模仿，甚至还会模仿欧洲人的社会等级制度和生活方式。米歇尔认为，部落划分是在城镇环境中形成的，它具有对内和对外两个层面的用途：对外主要是指移民劳动运用部落划分来确认彼此身份，以确定相应的行为模式，从而促进彼此之间的交往；在对内层面，共同的部落性则提供了个人关系的持久基础，有利于亲友网络和互助关系的形成。^④

^① See Godfrey Wilson, *An Essay on the Economics of Detribalization in Northern Rhodesia*,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68.

^② Max Gluckman, “Tribalism in Modern British Central Africa”, *Cahiers d’ études Africaines*, Vol. 1, No. 1, 1960, pp. 55–70.

^③ Max Gluckman, “Tribalism in Modern British Central Africa”, p. 55.

^④ J. Clyde Mitchell, “Tribe and Social Change in South Central Africa: A Situational Approach”,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Vol. 5, No. 1–2, 1970, pp. 83–101.

罗德斯—利文斯顿研究所的另一位人类学家爱泼斯坦指出，在这些矿业城镇中，关键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差异是欧洲人和非洲人之间的，而非不同部落之间的，部落忠诚的重要性主要体现为非洲人在工作场合之外的相互关系。爱泼斯坦还注意到，城镇中的部族界限很少是与来源地的部落划分一致的，这充分证明了部族主义并不等同于传统社会秩序的忠诚观念，而是日益形成的城镇社会不平等的表现。^①

罗德斯—利文斯顿研究所的人类学家关注的是“城镇中的部族主义”，他们强调族群是在现代城镇中形成的，主张通过农村民众在工业化地区中的经历来解释族群意识的形成。他们在强调族群本质上是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现象的同时，认为农村地区处于“传统部落”支配之下，“每个部落都是一个有着复杂内部结构的政治组织单位”^②，它们是与“现代城镇”相对立的，并未受到资本主义扩张和城镇化进程的影响。这些人类学家，无论其关注的是大规模劳动力流动究竟是会导致部落的人口、经济和文化衰败^③，还是会导致“部落凝聚力”以及文化保守主义的增强^④，他们都认定农村人口是以“传统部落”为组织形式的。

当然，有些人类学家已经意识到他们的研究对象绝不是界限明确的孤立部落。即便只是关注其中某个主导族群，他们也认识到所研究政治实体的多族群特征，福蒂斯和古迪等在其经典著作《非洲政治制度》一书中指出“没有哪个‘部落’……在领土、语言、文化或者政治上有明确界限，它们在这些方面彼此相互交融。”^⑤尽管如此，关于族群身份认同的形成过程、族群界限的划定等重大问题，人类学家此时尚未进行深入研究。

^① Arnold Leonard Epstein, *Politics in an Urban African Community*,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58, pp. 235–236.

^② Max Gluckman, “Tribalism in Modern British Central Africa”, p. 60.

^③ See Issac Schapera, *Migration Labour and Tribal Life: A Study of Conditions in the Bechuanaland Protectorat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7.

^④ See William Watson, *Tribal Cohesion in Money Economy: Study of Mambwe People of North Rhodesia*,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58; J. Van Velsen, “Labour Migration as a Positive Factor in the Continuity of Tonga Tribal Socie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 8, No. 3, 1964, pp. 265–278.

^⑤ Meyer Fortes,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the Tallensi: of the Northern Territories of the Gold Coast”, in Meyer Fortes & E. E. Evans-Pritchard eds., *African Political Syste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 239–240.

二 “从部族到国家”：族群与非洲国家建构 (20世纪60—70年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殖民当局在非洲殖民地推行地方政府改革，用地方委员会来取代土著当局，从而有效限制了土著酋长的权威，“部落”概念在殖民当局以及独立后非洲国家的官方话语中逐渐去政治化。到20世纪60年代，随着非洲国家相继独立，“部落”一词逐渐被“族群”或“文化”所取代。然而，族群的影响力非但未在现代化冲击下消退，其在非洲政治中的重要性反而日益凸显，这使得学者们更加关注族群在后殖民时代非洲国家建构中的作用。

在关于族群与非洲国家建构的研究中，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将农村中类似礼俗社会（Gemeinschaft）的共同体称作“部落”，而将有着共同的祖先或文化的城市群体视作“族群”，他强调城市族群的成员身份界定与农村部落不同，是高度灵活的。沃勒斯坦预测，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对于这些新族群的忠诚将逐渐与对于部落共同体和政府的忠诚相重叠，因而成为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纽带。通过提供新的技术、知识和关系网络，族群网络使得农村移民劳动力得以“重新社会化”（resocialization），从而推动个人的社会流动，并避免出现僵化的阶级界限。而且，族群也是政治紧张关系的宣泄途径，沃勒斯坦借用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指出，族群充当了重要的“替罪羊”角色，对于新政府的不满会转化为针对掌权的某个人或某些族群的不满，从而大大降低了政治破坏力。^①

随之而来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围绕教育、收入、经济资源以及政治影响力等方面的竞争缘何围绕族群，而非阶级或宗教展开？对此问题，罗伯特·贝茨指出，族群的形成可以视作非洲人试图应对现代化冲击的一种尝试。换言之，在现代化进程中，在身份标准日益趋同而空间差异存在的情况下，族群成为争夺稀缺的“现代性成果”（goods of modernity）的有效政治资源。现代性发源于中心地区，然后扩散到边缘地区，中心地区的

^① Immanuel Wallerstein, “Ethnicity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 in West Africa”, *Cahiers d’ études Africaine*, Vol. 1, No. 3, 1960, pp. 129 – 139.

现代化程度最高，邻近地区的发展程度相对较弱，边缘地区最为落后。而且，殖民政策也刻意将某个族群限定在特定地区，这在空间结构上所导致的结果是，受现代性影响最深的地区会按照族群界限而组织起来。^① 弱势群体也逐渐相信自己之所以处于劣势地位，在于未能有效激发族群归属感。在这种情况下，弱势群体中的知识精英会扮演起族群观念的“宣传者”角色，他们组织起族群共同体，致力于推动本地区发展，并向农村大众灌输对于族群共同体的归属感。^② 对于政客而言，诉诸族群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因为选民多来自某个族群，共同的族群诉求能产生共同支持。^③ 一旦这一机制处于运转之中，族群政治机制、恩庇侍从网络都会随之形成，而这将使得族群在现代国家资源的争夺中拥有持久的“战略效用”^④。此后整个20世纪70年代，西方学界关于“族群泛政治化”的讨论基本沿袭了贝茨关于族群是政治利益群体的观点。

概括起来，无论是20世纪50—60年代的部族与城镇化研究，还是20世纪60—70年代的族群与非洲国家建构研究，都是由本质主义（primordialism）和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这两种研究范式所主导的。本质主义强调的是族群认同有着古老的文化基础，它试图解释族群如何通过唤起共同的历史和文化归属感来释放族群的情感力量。受到现代化理论中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观念的影响，本质主义强调部落社会是停滞不前的，因而无法解释族群情感被唤起的时机与动因。工具主义关注的是族群身份认同被当作实现政治或经济目标的工具，尤其表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在非洲城镇化进程中，移民劳动力运用族群网络来应对城镇中的混乱、贫穷与竞争；第二，民族主义者借助族群力量来获取政治支持，攫取国家资源；第三，文化精英借此提升自身在民族国家中的地位。因此，工具主义揭示了族群认同并非固定的，而是依据环境而不断变化的历史现象。但是

^① Robert H. Bates, “Ethnic Competition and Modernization in Contemporary Africa”,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6, No. 4, 1974, p. 475.

^② David . B. Abernethy, *The Political Dilemma of Popular Education: an African Cas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 108.

^③ Robert H. Bates, “Ethnic Competition and Modernization in Contemporary Africa”, pp. 469 – 470.

^④ Stanley Tambiah, “Ethnic Conflict in the World Today”, *American Ethnologist*, Vol. 16, No. 2, 1989, p. 343.

与此同时，工具主义无法解释族群的具体内容，尤其是使族群成为政治动员有效手段的情感因素。^①

这两种研究范式所关注的是族群研究的不同层面。本质主义强调的是族群的文化层面，尤其是它的深刻情感特征以及历史文化根源，这使得它不同于其他政治认同与动员。工具主义强调的是族群的物质层面，强调族群动员是为了追求物质利益。^② 这两种研究范式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接受族群为非洲基本的社会秩序。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建构主义理论则从根本上对这一假定提出了挑战。

三 殖民统治与“部落的发明”：建构主义的族群理论 (20世纪80年代)

20世纪80年代，特伦斯·兰杰（Terrence Ranger）、约翰·伊利弗（John Iliffe）和约翰·隆斯达尔（John Lonsdale）等非洲历史学家在研究殖民时期南部和东部非洲历史的基础上，提出了殖民主义“发明”部落的理论。由于这些历史学家着重强调“部落”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因此被称作族群研究中的“建构主义”流派。无论是本质主义，还是工具主义，它们都将族群视作非洲基本的社会秩序，而建构主义则对此提出挑战。按照建构主义的观点，现代的“族群”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殖民当局和非洲精英打着恢复传统社会秩序的幌子“发明”出来的。

建构主义的族群理论大致包括以下四方面内容：

第一，前殖民时代的非洲社会并不存在界限明确的部落或族群。建构主义认为，前殖民时代的非洲人同时隶属于家庭、血统、宗教秘密团体、乡村共同体和酋长领地等流动的、相互重叠的社会网络。忠诚感和认同是无规则的、复杂多变的，并不存在界限明确的部落，政治和社会文化疆界

^① Thomas Spear, “The Neo-traditionalism and the Limits of Invention in British Colonial Africa”,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Vol. 44, No. 1, 2003, pp. 16–17.

^② J. D. Y. Peel, “The Cultural Work of Yoruba Ethnogenesis”, in Elizabeth Tonkin, Maryon McDonald, Malcolm Chapman, eds., *History and Ethnicity*, London: Routledge Press, 1989, pp. 198–200.

是灵活多变的，非洲人处于多种多样、相互重叠的集体认同之中。^① 而且，在前殖民时代，尤其是19世纪后期，非洲社会绝非一成不变的，例如津巴布韦的绍纳族和尼日利亚的约鲁巴族等，他们早在前殖民时代即已作为文化群体而存在，但是制度和意识上的成形则要到殖民统治时期。^②

第二，就非洲而言，现代意义上的族群是在殖民统治时期形成的，非洲族群在形式、范围和内容上受到殖民主义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力量的深刻影响。^③ 对于非洲社会而言，殖民统治之下急遽而不平衡的社会变革无异于一场道德和物质危机，族群正是在这些相互交织的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变革进程中形成的。殖民政府的结构特征，以经济作物生产和工资劳动力为基础的殖民政治经济，殖民政府对于政治边界的划定以及对于非洲民众的分类，所有这些都急遽地改变了非洲的社会结构和空间组织，成为塑造族群认同的形式和内容的主要结构因素。在这一点上，法属和英属非洲殖民地的情况是相似的，前殖民时代的法属非洲社会是不稳定的、流动的自我维持体系，族群在前殖民时代是并不存在的，族群的形成与法国行政管理者、传教士以及民族学家运用“人种逻辑”（ethnological reason）和“种族政治”来界定非洲社会有着极大关系。^④

第三，非洲族群身份认同的形成受到欧洲殖民宗主国政治文化，尤其是欧洲人对于非洲习俗和社会状态的认知的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法殖民当局逐渐改变了殖民地公职人员从殖民地的欧洲移民中招募的状况，改由伦敦、巴黎的殖民部门统一从帝国本土的大学和军事院校招募，用以加强帝国本土对于殖民地的管控。作为帝国本土公务员体系的海外延伸，这些殖民官员所秉持的民族主义理念深刻影响到非洲族群的形成。几乎同时兴起的文化相对主义思潮，对于传统的种族主义观念做出了

^① A. W. Southall, “The Illusion of Tribe”, in Peter W. Gutkind, ed., *The Passing of the Tribal Man*, Leiden: Brill, 1970, p. 35.

^② 关于绍纳族，参见 Terence Ranger, “Missionaries, Migrants and the Manyika: the Invention of Ethnicity in Zimbabwe”, in Leroy Vail, ed., *The Creation of Tribalism in Southern Africa*, James Curry Press, 1989; 关于约鲁巴族，参见 J. D. Y. Peel, “The Cultural Work of Yoruba Ethnogenesis”, pp. 198 – 200.

^③ Bruce Berman, “Ethnicity, Patronage and the African state: the Politics of Uncivil Nationalism”, *African Affairs*, Vol. 97, No. 388, 1998, p. 311.

^④ Jean-Loup Amselle, *Mestizo Logics: Anthropology of Identity in Africa and Elsewher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 – 18, 41 – 55.

重大修正。受其影响，保存土著社会、文化和权威性被英国殖民部视作主要的政策目标。英国殖民部的观点是，非欧洲种族有权维持自己的种族特性；土著的社会文化和政治机构有其内在价值，应当成为土著社会演进的基础。^①

欧洲殖民官员将非洲社会理想化为由部落所构成的小规模的、统一的“有机共同体”，有着内在秩序，稳定而又和谐，认为非洲部落社会代表着一种值得珍视的社会秩序与文化，“每个非洲人都属于一个部落，正如每个欧洲人都属于某个民族”，他们相信自己所面对的非洲“是由有着明确界限、同质的部落构成的”^②。在殖民官员看来，非洲社会所表现出的灵活性、流动性和模糊性等特征，是外部入侵、长期内讧和帝国征服等因素所导致的畸形状态，而保护部落“传统”是维持非洲社会稳定所必需的，正如一位资深的东非殖民官员所说，“保护非洲部落的精神，就如同保护非洲土壤一样重要”，货币经济、税赋、基督教信仰，这些都是导致部落动荡的因素，势必“在部落肌体上留下深深伤疤”^③。

第四，殖民者、传教士和人类学家在非洲族群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1) 殖民者试图通过与“部落权威”的合作，从而统治这些被明确划定界限的行政单位。殖民者认定这些行政单位其内部是由某个部落构成的，通过运用人口统计和地图等治理手段，将所有群体、个人和土地都贴上了独特的部落认同和特定地区的标签。为了控制非洲人在部落地区之外的活动，英法殖民者还采取限制人口流动和划定界限等措施，甚至在某些殖民地建立土著人口登记制度(Native Registration System)。例如，肯尼亚的土著登记制度于1915年获得立法通过，并于1920年付诸实施，这在当时是一项极为浩大的工程，表明了殖民政府控制非洲劳动力的强烈意

^① 参见洪霞《文化相对主义与间接统治制度》，《世界历史》2003年第2期，第45—52页。

^② John Iliffe, *A Modern History of Tanganyik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323.

^③ Timothy Parsons, “Being Kikuyu in Meru: Challenging the Tribal Geography of Colonial Kenya”,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Vol. 53, No. 1, 2012, p. 74.

愿。^① 殖民政府还对“部落”的文化习俗做了僵化界定。在非洲酋长和年长者所提供的信息的基础上，殖民者整理制定了一系列具有内在连贯性的法律规则，主要用以规范“部落”民众的婚姻、土地与财产权，这就是非洲习惯法的形成过程。殖民政府赋予酋长头领和年长者在习惯法制定中极大的权力，从而使其掌握了分配资源给年轻人、妇女和外来移民的控制权。^② 殖民者意图通过以上这些措施将非洲社会变革限定在“部落”之内，避免出现影响力遍及整个殖民地的社会力量，从而有效地维护殖民统治。^③ 正是基于此，兰杰精辟地指出“整个殖民时代的非洲，当欧洲人自以为尊重非洲古老传统之时，也就是影响最为深远的传统被发明之日。所谓的习惯法、依据传统习俗而确定的土地权和政治结构等，所有这些事实上都是殖民法典化的发明。”^④

(2) 人类学家在非洲族群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在英国居于主导地位的功能主义人类学强调文化的同质性，忽视地区差异，倾向于将单个地区的田野调查结果视作普适结论。尽管人类学家和殖民官员的关系时常是紧张的，前者绝非单纯的殖民统治辅助力量，但是他们同殖民官员一样希望维持非洲社会内部的稳定和凝聚力，从而增强了“非洲社会内部界限明确、组织有序”^⑤ 的观念。也有研究表明，人类学研究直接影响到一战期间法国对非洲酋长的态度。直至一战之

^① Bruce Berman, *Control and Crisis in Colonial Kenya: The Dialectic of Domination*, James Curry Press, 1990, pp. 147, 153.

^② Sally Falk Moore, *Social Facts and Fabrications “Customary” Law on Kilimanjaro*, 1880—198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Martin Chanock, *Law, Custom and Social Order: the Colonial Experience in Malawi and Zambia*, Heinemann, 1998.

^③ 近年来的非洲史研究表明，间接统治制度事实上是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殖民宗主国在非洲广泛推行的统治制度。以法属西非殖民地为例，“一战”后，法属西非殖民统治政策经历了从强调“封建解放”和“直接接触”的“同化”(assimilation)政策向保护土著政治结构的“联合”(association)政策的转变。法属西非的殖民统治依靠着大约47000名乡村酋长和2206名的地区酋长。See Alice L. Conklin, “‘Democracy’ Rediscovered: Civilization through Association in French West Africa (1914—1930)”, *Cahiers d’Etudes Africaines*, Vol. 37, No. 145, 1997, pp. 59—84; Mahmood Mamdani, *Citizen and Subject: Contemporary Africa and the Legacy of Late Colonial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④ Terrence Ranger,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in Colonial Africa”, in Eric Hobsbawm, Terrence Ranger, eds.,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250.

^⑤ Adam Kuper, *Anthropology and Anthropologists: The Modern British School*, London: Routledge, 1983, pp. 99—120.

前，法国殖民官员总体上仍对传统酋长持怀疑态度，而一战后殖民地现代精英阶层的兴起及其平等权利诉求，使得殖民官员将这些现代精英视作更加危险的威胁。在这一背景下，法国人类学研究强调非洲制度和习俗虽然是落后的，却无法彻底根除，应当在尊重酋长等非洲本土制度的前提下推行渐进变革。^① 在这些观念的影响下，殖民官员认识到，“在西非及其他地区，我们犯了一个错误：全部摧毁了土著社会结构而不是改进它来为我们的统治服务”^②。同样重要的是，人类学分析提供了描述非洲社会的方法，明确了文化客体，从而为非洲知识精英建构族群和身份认同创造了条件。^③

(3) 传教士通过创造传播标准化的非洲本地语言，对于非洲族群文化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为了理解非洲本地的皈依者并更好地同其交流，传教士根据众多非洲当地方言中的某一种来编纂语法和词典，他们通常将驻地附近的方言变成整个“部落”语言的权威版本，并通过教会学校来传播这种语言，从而极大地促进了非洲本土知识精英的发展，推动了标准化的非洲历史与文化的记录。

总之，建构主义的族群理论强调，前殖民时代的非洲社会并不存在界限明确的部落或族群，族群是在殖民统治时期形成的。这一理论对于殖民统治与非洲族群形成之间的关系做出了富有说服力的解释。不过，所谓“族群是殖民者的创造物”的观点，既无法解释同一殖民地之内不同地区族群意识发展的不均衡性，同时也过分强调了殖民者的能动作用。事实上，在部落的“发明”过程中，起作用的不仅仅有殖民政府、传教士和欧洲人种学家，酋长、教会学校毕业生以及年长者等非洲本土社会群体也会从自身利益出发，积极参与其中。他们在族群形成过程中，尤其是部落“习俗”法典化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部落框架之所以能在非洲生根，必须与非洲本土社会发展相契合，正如伊利弗所指出的，“英国人错误地认为坦噶尼喀人属于不同的部落，坦噶尼喀人创造出在殖民框架下运作的部落……欧洲人相信非洲人属于不同部落，非洲人则构建出自己所

^① Ruth Ginio, “French Colonial Reading of Ethnographic Research: The Case of the ‘Desertion’ of the Abron King and its Aftermath”, *Cahiers d’ Etudes Africaines*, Vol. 166, 2002, p. 340.

^② 转引自李安山《法国在非洲的殖民统治浅析》，《西亚非洲》1991年第1期，第28页。

^③ Thomas Hylland Eriksen,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London: Pluto Press, 1993, pp. 15 – 17.

属的部落”^①。

四 “发明的限度”：建构主义族群理论反思 (20世纪90年代以来)

20世纪90年代，随着非洲族群和非洲历史研究的深入，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学者们逐渐意识到“发明”概念过分强调了欧洲殖民者的主动性。尽管建构主义和工具主义有助于解释非洲族群的出现，却过高估计了非洲知识精英和帝国官员创造新的族群认同的能力，严重忽视了前殖民时代和殖民时代的历史连续性，更无法解释当代部族主义的力量和内容。“传统的发明”概念的提出者兰杰，于1993年发表了《反思“传统的发明”》一文，他在文中指出，自己以前所提出的“传统的发明”实际上是一个单向的过程——欧洲人“发明”出僵化的族群，非洲人则被动地放弃自身古老的、更为灵活的认同。兰杰强调，殖民时代非洲传统和族群的“发明”，绝不是僵化地将殖民主义者发明的传统强加在变动的非洲习俗之上，而是欧洲人卷入到非洲社会内部剧烈的变革进程，欧洲和非洲的文化和认同在其中处于持续的调和与冲突之中。兰杰本人甚至质疑他自己所提出的“发明”概念本身，他认为这一概念是令人误解的，应由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提出的“想象的”(imagined)概念来代替。^②

概括起来，对于建构主义族群理论的批判与反思，构成了这一阶段非洲族群研究的主要内容。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在族群“发明”过程中，殖民官员、基督教传教士和欧洲人种学家的作用有限。“族群”概念并非欧洲殖民者随意创造的，族群化过程在前殖民时代已经存在，并在殖民统治、地区交流网络、移民和城镇化进程中不断得以发展。族群意识有着自身的完整性、结构原则和沿革历

^① John Iliffe, *A Modern History of Tanganyika*, p. 324.

^② Terrence Ranger,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Revisited: the Case of Africa”, Terrence Ranger & Olufemi Vaughan, eds., *Legitimacy and the State in Twentieth Century Africa*, London: Macmillan, 1993, pp. 79–83.

史。虽然殖民统治时常会导致现存概念的变革，但它们并未创造这些概念，而且它们也发现自己不但未能控制非洲族群形成过程，反而受其影响。因此，族群处于持续的重新解释和建构进程之中。^① 马哈茂德·马姆达尼（Mahmood Mamdani）批评到，所谓的殖民官员为了实施“分而治之”政策制造出族群认同的观点，无异于认为部落是“外国人鼓动的阴谋”或者是非洲精英的“当地人阴谋”的产物。^②

在研究殖民时代肯尼亚梅鲁人（Meru）保留地中客居的基库尤人（Kikuyu）群体身份认同的基础上，蒂莫西·帕森斯强调，殖民者试图通过土著保留地将身份认同与部落空间联系起来，通过以部落为基础来建构政治和社会话语，从而为族群认同的形成创造了条件。但是即便如此，殖民者并不能决定部落的确切含义，非洲民众在部落归属问题上所具有的能动性远远超出殖民官员的想象。^③

第二，殖民主义的部落“发明”是建构在非洲族群自身复杂的“自我群体过程”（we-group process）基础之上的。这一过程在不同殖民地表现出很大差异，大致包括以下四方面内容：首先，族群分类成为固化（或重新确立）社会不平等的主要工具；其次，殖民当局与酋长和教会学校学生之间的合作，导致欧洲与非洲本土认同模式的相互交织。在这一过程中，一些新的行为、象征和历史会被作为“传统”而引入，而旧有因素则会经过法典化而成为“习惯法”；再次，殖民统治的日常行为使得新形成的族群认同得以巩固，从而使其看起来是自然的，这一过程即“本质化”（essentialisation）；最后，殖民地社会变迁之下非洲民众的实际需求是族群赖以存在的重要基础，非洲殖民地的劳动力流动、城镇化以及农村社会关系的货币化，所有这些社会变迁都强化了非洲民众的不安全感以及对于“传统”价值观的诉求，也使得新的族群意识形态对于非洲民众颇具吸引力。^④

第三，非洲族群既非古已有之，也不是欧洲殖民官员无意间的创造，

^① Thomas Spear, “The Neo-traditionalism and the Limits of Invention in British Colonial Africa”,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Vol. 44, No. 1, 2003, p. 24.

^② Mahmood Mamdani, *Citizen and Subject*, p. 187.

^③ Timothy Parsons, “Being Kikuyu in Meru”, pp. 65–86.

^④ Leroy Vail, “Introduction: Ethnicity in Southern African History”, in Leroy Vail, ed., *The Creation of Tribalism in Southern Africa*, pp. 13–16.

而是非洲社会现代化经历的组成部分。族群的形成过程要早于殖民统治，是在殖民征服、地区贸易网络、移民流动和城镇化的环境下发展的。族群有其自身的完整性、结构原则和变革历程。殖民统治者在试图控制非洲族群形成过程的同时，也受到这一过程的影响。

约翰·隆斯达尔（John Lonsdale）试图将族群的形成置于非洲社会现代化进程之中来理解，他认为族群的形成分为“道德族群”（moral ethnicity）和“政治部落主义”（political tribalism）这两个层面。“道德族群”概括的是族群的内部变化，主要是围绕权威合法性、财富分配、共同体的社会界限与成员身份而发生的竞争，这是在传统的道德经济和阶级、性别和年龄关系遭到破坏的情况下发生的。“政治部族主义”是指族群的外部变化，是形成中的族群之间以及族群与殖民政府之间在争夺现代性资源方面的竞争，这些竞争是由1945年之后殖民政府所推动的“发展”项目所触发的，因为这些“发展”项目迅速增加了殖民政府所能分配的社会经济资源的数量，族群因而成为争夺现代性资源的重要工具。“道德族群”表明的是一种历史层面的集体自我，而“政治部族主义”则是由间接统治和后殖民政治所导致的竞争性政治。隆斯达尔的这一理论框架不仅驳斥了非洲人在殖民统治之前没有集体感的说法，而且也揭示了较早的道德族群形式在殖民和后殖民时代如何重构，进而改变为不同形式的政治部族主义，从而影响到当代非洲国家政治的发展。^①

第四，族群认同的形成过程因地区、历史而异，没有关于族群的普适理论，只能从历史视角来研究族群。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识到，族群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族群是不断地被重新解释和重新建构的，建构主义、工具主义和本质主义等研究范式所强调的是族群的不同特征，应当对族群进行具体的案例研究，正如著名的非洲人类学家约翰·科莫洛夫（John L. Comaroff）所说，“所有的族群认同都并非‘事物’，而是一种关系，其内涵是在持续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因此我们无法抽象地界定族群或民族主义的实质，这也是我们至今仍未能总结出普适的族群或民族主义‘理论’的原因，我们所获得的只是有关历史和意识的理论，这些只是有助

^① Bruce Berman and John Lonsdale, *Unhappy Valley: Conflict in Kenya and Africa*, London: James Curry Press, 1992, pp. 328 – 330.

于说明认同的生成过程”^①。

简而言之，20世纪90年代以来，建构主义理论所强调的前殖民时代非洲社会并不存在“部落”，“部落”是殖民时期的历史产物，这些重要观点逐渐成为学界共识。与此同时，建构主义所强调的“族群”是殖民者“创造物”的观点日益受到批判，学者们强调殖民者“发明的限度”，强调非洲本土社会力量在非洲族群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从而对建构主义族群理论做出了有益的修正与补充。

结语

半个世纪以来，围绕着殖民统治与非洲族群形成的关系这一主题，西方学界进行了大量深入细致的研究。概括起来，西方的非洲族群研究相继出现了部族与城镇化进程研究、族群与非洲国家建构研究、建构主义和建构主义反思等研究流派，先后出现了本质主义、工具主义和建构主义等研究范式。并不存在普适的族群理论，这已经成为当前的族群研究中的基本共识，学者们大多强调从历史视角进行具体的案例研究。推动族群研究发展的主导学科也经历了从人类学到政治学再到历史学的转变，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相关研究更是呈现出跨学科综合研究的发展态势，从而推动非洲族群研究不断得以深化。

非洲族群研究无疑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在当代的媒体报道和学术研究中，“部落”或“族群”往往被认为是与现代性背道而驰的，是非洲国家发展失败的主要原因，被看作是“文化幽灵……是起源于非洲农村遥远过去的返祖余孽，理应随着时光流逝而消散，（但是）仍然拒绝遵从社会和政治变迁的基本法则……按照这一观点，族群意识是一种集体非理性的表现形式”^②。这一流行观念不仅与非洲历史不符，更妨碍了我们对当代非洲国家发展的认知。西方学界的相关研究揭示出，前殖民时代的非洲

^① John L. Comaroff, “Ethnicity, Nation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in an Age of Revolution”, in Edwin N. Wilmsen & Patrick McAllister, eds.,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Ethnic Premises in a World of Power*,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62–183.

^② Leroy Vail, “Introduction: Ethnicity in southern African History”, pp. 1–3.

并不是由界限鲜明的部落所组成的僵化的、停滞不前的社会，族群或者“部落”是在殖民统治时期形成的。不过，族群并非西方殖民者的创造物，在族群形成过程中起作用的不仅有殖民官员、西方传教士和人类学家，同时也包括非洲当地的酋长、教会学校学生、年长者以及下层民众，“族群”是非洲社会建构过程的产物。换言之，“部落”或者“族群”的形成，是建构在非洲社会结构演变的基础之上的，是非洲现代化经历的重要组成部分。

(责任编辑：周军)

Colonial Rule and the Making of Ethnicity: an Overview of the Studies of African Ethnicity since the Second World War

Li Pengtao Che Neng

Abstract: Since 1945 , western academia has undertaken enormous research on African ethnicity , with a focus on the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lonial rule and the making of ethnicity. Four major research currents has emerged , which in chronological order , are studies of tribalism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 discussions of ethnicity and the nation-building in Africa , researches on the constructionism and colonial tribe “invention” , and the reflections on the constructionism. These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the pre-colonial Africa was not rigid society consisted of bounded tribes , “tribe” or “ethnicity” was formed in the colonial era , but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ethnicity” was the invention of European colonizers , but the creature of African social construction process. The colonial tribal “invention” , built upon the basis of African social structural evolution , was an integral part of African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Africa , Ethnicity , Tribe , Colonial Rule , Modernization